

编者按

国有国史，家有家史。我们每个人的家，都跟着国家发展的长河缓缓流淌。对于大多数90后、00后来说，逝去的时代可能会让他们有一个“隔代”的距离感，如何打破这种距离感，需要我们站在新的高度、广度与深度上理解文字回忆和记录在当代中国所承担的任务与使命。

作者史世友老人，积极传承家族记忆、传递家族情感，培养其关注身边、记录生活的意识《我的叔父史继红》——一个家族的回望与潜思，缅怀先辈，沐浴红色家

风，让我们共同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红色家史：

我的叔父史继红

史世友

我的叔父史继红，于1937年“7·7”事变后，不堪国仇家恨，毅然离家出走，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战争中，他英勇杀敌，舍生忘死；在辽沈战役的攻城战斗中，叔父身负重伤，后转业到东北的牡丹江市工作，于1991年病逝，享年70岁。鉴于那时的条件限制和路途遥远，未能前往致祭，至今内疚。

如今我年过古稀，尽管从未去过东北牡丹江，但却产生要在那里探亲的强烈愿望。那里还有我从未谋面的两个亲堂妹，希望能与她们相见团聚，并去祭拜叔父，以寄托哀思，实现余生一个心愿。

2015年6月25日，我在妹妹史世兰的陪同下，踏上去牡丹江的旅程。老农我第一次坐飞机，座位恰好靠近窗口。我在欣赏祖国蓝天奇妙景色的同时，想着今天安居乐业的好生活，感慨万千，不由想到了叔父。

那是1953年9月下旬，离家出走16年、杳无音讯的叔父，突然从遥远的东北牡丹江回到家乡舒城县桃溪镇探亲。那时我才10岁，其时我爷爷奶奶、父母都还健在。

叔父16岁时，时值1937年“7·7”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全民抗战战爆发，我还没出世。那时，我们家不住在桃溪镇，爷爷奶奶、父母和叔父以及叔父的未婚妻一家六口人，居住在舒城县千人桥石河的一个叫熊家老庄的地方。在那民族遭遇外侮内患的兵荒马乱年代，千人桥的土匪也趁机



作恶。因叔父未婚妻长相俊俏，被当地一束姓土匪头子盯上了。最终，在一个风高夜黑的冬夜，她被踬入家中的众多土匪挟持抢走了。抢夺过程中，叔父的未婚妻曾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叔父乳名；叔父欲上前与土匪拼命，被爷爷奶奶死死拽住。我的父母不顾一切地上前与土匪争夺，结果在拉扯中均遭土匪毒打致伤。家中遭致如此劫难欺凌，在那样的乱世年代是无处讲理，诉冤无门的，全家人只能处于无奈的悲愤中。此时的叔父受到很大刺激，他沉默寡言，只说过一句话：去找共产党！

不几天叔父竟不辞而别，毅然离家出走了，从此无任何音讯。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中人由期盼叔父回家变为失望，后来渐渐都认为叔父不在人世了。不料，他还活着回来了。那天，我放学快到家时，远远看到家门门口站着一些人，都是邻居们到我家看望叔父的。我跨入家门，见屋里挤满了人。我从人缝中看到爷爷奶奶、父母都在擦着泪水，应是喜极而泣吧。眼前的叔父三十出头年龄，穿着一身便服，端坐在厅屋桌边板凳上，他不时站起与前来看望他的邻居们握手、递烟。叔父胸前挂满了勋章，那时的我还好奇地认为叔父胸前所挂的这些东西是种别样的穿戴讲究，并不知道叔父曾历经过血肉腥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九死一生立下诸多赫赫战功而获得这些勋章的价值和意义。

父亲从人群中看到了我，他把我拉向叔父说“这是你侄儿世友，十岁，读三年级了。”叔父微笑着伸手把我拉向他，抚摸着我的头，问我读书怎样，叮嘱我：“要好好读书，没文化不行。”我胆怯地点着头。叔父当年对我的叮嘱让我记住一辈子，尽管后来只上过小学，但在沧桑岁月里无论多忙，总不忘记看书识字，多学点文化。

在叔父回家的那段时间里，实在是家中人其乐融融最幸福的日子。记得时任桃溪区区区长汪诚还来我家看望过叔父，表达慰问。还记得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吃中午饭，家中走

进一个衣着朴素、年方三十左右，端庄整洁的妇女。她一见叔父竟放声恸哭，全家人都在一旁默默流泪，连倔强的叔父也不时掏出手帕擦着泪。我被这场面弄糊涂了，忍不住偷偷问母亲来人是谁，才知道她就是当年被土匪劫持抢夺去的原叔父未婚妻。在家人的劝说下，她终于止住泪。她向叔父倾诉思念之情。她告诉叔父，之以后来脱离虎口，是在她被强霸两年多后，因该土匪头子不知从哪里听说叔父在大别山里当了新四军，吓得昼夜睡不着觉，唯恐有一天性命难保，只好把她放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不知叔父是死是活，被迫嫁人。她说她对不起叔父，要求通过政府与叔父重结良缘。叔父安慰她，一切都是乱世带来的，没办法，自己在牡丹江也已有家室，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今后有什么困难可向他写信。

在那段时间里，每当万籁俱静的夜晚，叔父和爷爷奶奶、父母总是坐在一起共叙别后之情。那时，小小的我也常坐在一旁静听大人们说话。从他们的谈话中使我清晰记得，我家之所以后来搬迁到桃溪，是因为叔父当年离家出走多年后，国民党千人桥区政府获悉叔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隔三差五找家中人麻烦，不时追问叔父下落，曾威逼爷爷到大别山里找叔父回家自首，爷爷为此还坐过牢。为躲避这种侵扰，爷爷主张，被迫举家迁居桃溪避难。叔父告诉家人，那时新四军里大多数人不与家庭联系，就怕连累家人。叔父说解放后，因所担负的工作繁忙，未能及时回家，曾写过信回家，但总盼不到回信，不知家已迁离了。

很多年后，我从父亲日常有意无意的转述中，了解到叔父入伍生涯中所经历的战争和无数次战斗中的一些杀敌故事。

1937年11月，叔父满怀愤恨地离家出走后，径直向舒城南端梅河方向的大别山深处走去，因为他听讲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活动。他辗转于深山，以乞讨和摘山上的野果充饥，夜宿农家草垛，历尽艰辛，最终于当年12月找到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初入伍时，领导给他发了一把大刀，他曾大胆要求发枪，领导笑着说：“小家伙，枪会有的，暂时用刀，要练好刀功杀敌人。”1938年初，叔父所在的红军游击队被编组为高敬亭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某部。同年，四支队为执行保卫武汉正面抗日战场任务，曾在桐城的大关、小关设伏，以奇袭战术牵制日军。叔父年小，虽第一次参加战斗，但含垢受辱之气使他毫无畏战畏死情绪。在这次战斗中，他和战友们一起趁夜色，偷袭了一辆抛锚的日军运输车，击毙和砍死车上四个日本兵，缴获一批武器，炸毁车辆后，又火速撤离，消失在公路旁的崇山峻岭中。

1940年下半年，叔父所属部队奉命开赴安徽无为县开展对日反“扫荡”战斗，在该县石涧埠与日军不幸遭遇，双方展开惨烈的肉搏战。叔父反应敏捷，训练有素，曾手疾眼快地挥刀砍死两个日本兵，结果后股被日军深刻一刀。他伴死于尸堆，骗过日军，直至黑夜被探寻战场的当地地下党救起，隐藏于百姓家中后，请郎中为其治伤。

叔父曾和父亲说，抗战中，他经历过数次与日军遭遇的白刃战和多次反“扫荡”战斗，很多战友战死了，拼红了眼，没功夫想到死，身边的人转眼就牺牲了，有的战友在被日军刺中尚未倒地地那一瞬间，硬是拼着最后一口气力向日军反刺一刀，同归于尽。每听父亲转述，就想到战争的残酷和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无数英烈们，陷入深深的感慨中。

1940年11月，叔父被上级提拔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任警卫连班长。1941年初，“皖南事变”突发，部队被打散后，他跟随军首长袁国平指挥突围。他目睹袁国平不幸中弹，为不拖累部队，用手枪自杀殉职。他曾伏尸痛哭，不忍离去。突出重围后，来到江北，最终找到在那里临时设立的新四军突围招待所，他和突围出来的幸存同志集结后，又被重新编组，继而开赴江苏盐城、辗转山东。在此期间，他埋过地雷，与军民一起毁过铁路，破坏过日军交通运输线。

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又爆发了内战。1946年，叔父时任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某部连长，随部被抽调开赴东北。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惨烈战斗中，他被一颗炮弹击

中，幸运的是弹片未击中要害，但右侧大腿被弹片穿透，受了重伤。

新中国建立后，因叔父身负多伤，转业分配到牡丹江市工作。在离家16年后的1953年，他是请假一个月回家探亲的。

叔父当年的探亲假很快到期。记得全家人送别叔父回牡丹江时，在去往桃溪车站路上，叔父牵着我的手，未曾想到当年对叔父的送别竟是永别。至1991年叔父在牡丹江逝世，他再也没回过家乡了。期间，他曾资助过家庭，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结婚时，他还曾为我邮寄过毛毯、皮鞋等用品。自叔父逝世后，两个堂妹在牡丹江先后结婚，建立了新的家庭，从此二十多年她们与我断了联系。

2015年6月25日的7745航班，准时由合肥到达哈尔滨机场，次日上午，我们乘火车赶往牡丹江。

我虽第一次来到这遥远的东北牡丹江，但不知为什么并不感到陌生。或许，这座城市曾经是叔父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长眠之地；此外，这里还有我两个亲堂妹……

当天下午，我按原叔父早年写信的工作地点，打的去东长安街(现东安区)的牡丹江市老药材公司询问。这是一条繁华街道，这里的人事和环境早已变迁，但人们都记得叔父的名字，恰巧还有一个女工作人员知悉大堂妹史敏娟的电话，她立即热心地与之联系。我们在那里等着。不一会，两个堂妹均由妹婿驾车前来。俩堂妹下车见我，竟不约而同地大声直呼：“哥！哥！”说我大像她们爸，一见就知道是安徽的哥哥。她们近乎狂喜地握住我和世兰妹的手，久久不想放开，彼此都热泪盈眶。从堂妹身上，我看到东北人的豪爽、重情。

我终于和俩堂妹相见相识，并欢聚在牡丹江。我想假如叔父在天有灵，也是感到欣慰吧。

俩堂妹在当晚举行的欢宴上谈起叔父生前的事情。她们说，叔父性格耿直，不苟言笑，但很善良，一生简朴，公私分明；叔父平时言语不多，很少谈他的战争经历。当她们说到晚年的叔父常念叨：“想回安徽舒城老家看看，想着世友”时，我的鼻子顿觉一酸，眼泪扑扑往下掉。我遗憾因种种情况未能在叔父生前来牡丹江，在他晚年牵牵他的手，就像我10岁时他牵我的手一样……

我急迫要去祭拜看望叔父。次日，在俩堂妹陪同下，前往二十多公里外的牡丹江西郊公墓。偌大的公墓肃穆、宁静，排列有序，叔父安息在这里。叔母是山东人，于2005年逝世，享年76岁，她和叔父合葬在一起。

在堂妹的引领下，我怀着悲愤、愧疚和对叔父的崇高敬意走近他墓前，我向叔父敬献花篮，忍不住嚎啕大哭跪拜在



↑叔父史继红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件(作者提供)

地，久久不愿站起。我默默向叔父说着话：60多年后的今天，侄儿来看您，太晚了，但毕竟来了，侄儿深知，您曾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地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战，忠骨埋异乡。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向着民国富强的中国梦迈进，已越来越强大。我们整个家族的生活和亿万人民一样，都过得幸福美满，您老在这里放心地安息吧……

晚年去牡丹江，实现了祭拜叔父与堂妹们相见相识的愿望，如释重负。

告别牡丹江时，俩堂妹依依不舍地挥泪相送。她们打算秋天带着叔父的遗愿，回安徽舒城老家看看……



如今美丽如画的舒城县桃溪镇。



一位不满15周岁的少年，1958年响应党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从大都市上海只身来到安徽寿县师范读中师。他从小受上海本土音乐——江南丝竹熏陶，9岁开始学二胡，11岁考入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民族乐队的经历，使他在在校期间就被抽调到六安地区代表队，参加全省水利文艺会演，开始走上学习、研究、保护、传承六安本土音乐之路，历时60余年耕耘不辍。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70年起，他为国家“非遗”项目——庐剧大戏《红楼梦》、小戏《茶山新歌》等数十部戏创作总谱并担任中西混合乐队的指挥，后又为本没有乐队伴奏的省级“非遗”项目——锣鼓书《赌祸》创作总谱，在省会演中获曲艺类最高奖。1981年，他历时十年写成的长达一万四千字的论文《庐剧音乐初析》被收入《戏曲音乐论文选》。这篇论文对庐剧唱腔体制、板腔单位结构形式、曲牌体制的

花腔小调、板腔体制与曲牌体制之间的血缘关系、传统的发展手法、小嗓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认可，被收入院刊《中国音乐》音乐学术参考资料条目。接着，他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了《民族管弦乐总谱写法浅谈》、《皖西民歌旋法特点初探》、《庐剧西路唱腔与皖西民歌的血缘关系》等论文约20余万字。1986年初，他受命编篡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曲艺音乐和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用两年半的节假日和夜晚，在全省率先独立完成了这两个集成的六安地区分卷共50余万字的编纂工作，并付梓出版，于1988年、2004年先后获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音乐家协会表彰。2007年起，先后出版了27万字的论文选《追求跨越》、8万字的《庐剧音乐概论》和30余万字的第二本文选《思路·话语》。

这位咬定“非遗”不动摇的上海少年，就是现已过75周岁的安安市文旅局退休公务员沈义龙。这位市政协老委员，在退休前后，仍在为“非遗”保护、传承建言献策，先后在报刊上发

沈义龙：

衣带渐宽终不悔

张 龙

表或向有关部门呈送了《对民族器乐再度灿烂的思考》、《找回对本土文化的坚定信心》、《别跟在洋人后面起哄——也谈保卫中国文化安全》、《关于扎实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建议》、《坚定中国音乐文化的自信》、《庐剧传承重在音乐》等20篇文章。最近还就“非遗”保护工作提交了建议。

沈义龙认为，“非遗”项目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完善的，它必须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发展。基于这种理念，他于2003年开始用创新方法保护“非遗”的尝试，历时5年，后经12次修改，独立完成了世界“非遗”项目——农历二十四节气的音乐载体——民族管弦乐套曲《中国节气》的创作。这一部堪称世界最长、用数个六安本土国家级、省级“非遗”音乐作为贯穿全曲主题而成的音乐作品，其浓重的“非遗”叠加效应，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它将节气各时段气候变化、物候变化、农事活动和传统节日、民风民俗融为一体，使节气具像化了、鲜活起来了、充满生气了，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